

连接自然与文化符号世界的现象学之桥： 评《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

康亚飞

Towards Phenomenology and Culture : A Review of Göran Sonneson's *Cognitive Semiotics*

Kang Yafei

书名：《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

作者：〔瑞典〕约伦·索内松（Göran Sonesson）

译者：胡易容、梅林、董明来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年

ISBN: 978 - 7 - 5201 - 5435 - 2

DOI: 10. 13760/b. cnki. sam. 202002019

《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是瑞典隆德大学约伦·索内松（Göran Sonesson）教授近 30 年的论文选编，展现了北欧符号学界极具代表的符号学家索内松的学术洞见。北欧符号学界具有欧陆哲学传统，又重视经验科学，呈现出与北美、亚洲不同的符号学研究取向。索内松教授学术背景深厚，曾在巴黎的格雷马斯小组从事十余年姿势符号和玛雅语言研究，回到瑞典后几乎以一己之力引领了瑞典的符号学研究，在以图像为代表的非语言符号领域贡献卓著，也形成了北欧符号学中瑞典的图像与认知符号学的独特研究取向。据译者介绍，此次为中国读者译介的部分论文是索内松教授基本理论和立场的呈现。

本论文集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现象学与意义理论》（Phenomenology

and Theory of Meaning), 内容偏向于理论原理; 下篇为《文化、传播与演化》(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主要涉及不同领域的应用问题。此种上下篇较为流畅的衔接逻辑, 并非索内松教授有意为之, 而是译者在选编时为了使读者能从全貌和具体两方面了解索内松的学术观点特意做的独具匠心的编排。索内松的认知符号学研究框架, 核心在于将现象学、符号学和认知科学三者进行结合, 试图通过现象学融通认知符号学的科学之维与人文之维。在他看来, 认知科学需要符号学“意义理论”的灌输, 而基于人文传统的符号学也欠缺经验研究的根基, 如果想要将这二者完美结合起来, 现象学必不可少。若缺乏任何一环, 这个框架都将沦为一种“折中拼凑”。

一、现象学作为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的桥梁

关于符号学的认知转向问题, 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的关系问题。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认为“‘认知科学’的另一个别名就可以叫做符号学”(西比奥克, 拉姆, 1987), 拉姆也提出“符号学是有关信息系统或结构的研究”(西比奥克, 拉姆, 1987), 二人一致同意将符号学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极大可能性。但此说法遭到了赵毅衡的反对, 他提出:“符号学是意义学, 认知符号学也不是一个新的符号学, 而是符号学的某个方向得到进一步强调。符号学, 尤其是延续至今的‘皮尔斯式符号学’实际上一一直是认知符号学。”(赵毅衡, 2015) 在他这里, 符号学原本就是认知符号学, 并非是认知科学, 更不是符号学的认知转向, 学界讨论的认知符号学, 实质上是符号学的认知科学化。赵毅衡将符号学定义为“意义之学”(赵毅衡, 2011, p. 3), 符号学的研究也始终处在文化世界, 属于人文学科, 而认知科学主要的研究方法来自观察和实验, 一般认为属于自然科学。索内松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二者长期以来较少交流的原因主要是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学科史非常不同(2019, p. 27)。“符号学的基本概念是符号, 而认知科学的基本概念是‘再现’”(2019, p. 27), 同时, 符号学更注重文本分析法, 而认知科学重实验方法。由此说来, 二者的分歧由来已久, 非一朝一夕所就。

面对这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索内松提出了他的方法, 这也是他在认知符号学研究中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首先, 他视符号学为“一门科学”(2019, p. 4)。这并非说符号学要走量化的路子, 用自然科学化的方式进行探索。相反, “符号学倾向于从定性的, 而不是定量的角度思考所有现

象，但它的目的是系统地阐述规律。而不是被还原为特定对象的阐释”（2019，p. 23）。这即是说，符号学是一门寻求普遍规律的、追求规范性的科学，它强调的是“范畴经验”；其次，他提出“认知科学的符号学转向”（Sonesson，2006），将重点落在了对意义问题的探寻上。最后，他建议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进行调和。因为在他看来，符号学的认知转向其本质是自然与人文在意义世界问题上的融通，而现象学恰好提供了方法论的桥梁。

鉴于此，索内松所提及的现象学并非基于认识论层面的研究，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来连接符号学和认知科学。符号学对世界的理解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而“现象学的任务是解释人类获得关于世界知识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哲学努力，现象学是关于我们经验世界的构成方式”（2019，p. 37）。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正好弥补了符号学方法论层面上的缺失。同时，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是理解生命世界理性结构的基础，索内松坚信“自然科学要变得完全理性，就需要现象学”（2019，p. 59）。尽管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悲观地认为我们一方面追求理性，另一方面却又免不了最终被理性束缚的命运，但索内松依然认为在人的生存、生活中，理性必不可少，理性是“永远追求更好的知识，同时有标准来确定我们现在所知的至少比我们昨天所知的更接近真理”（2019，p. 59）。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对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的结合持乐观态度。2020年，方圆在其《“自然化的现象学”是否可行——从当代认知科学的视角看》一文中对丹·扎哈维的“融通观”提出了批评。在她看来，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的解释模型并不一致，二者在事实层面上无法相互包容，因此，主观地将其结合缺乏可行性，只能是空谈（方圆，2020）。方圆的观点与胡塞尔的本意有某种相似性。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书中，胡塞尔明确表示反对自然主义，“对于实现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可能性而言，仅仅反驳自然主义还不够。我们必须对它的基础、它的方法和它的结果进行积极的批判”（胡塞尔，1999，p. 81）。

对于现象学的自然主义转向之争，索内松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将胡塞尔和皮尔斯都看成现象学家，且二人都认为“理性问题真正发挥作用是在科学的舞台上”（2019，p. 59），而“现象学方法发现了作为生命世界之基础的理性结构”（2019，p. 54）。他的意思是，当我们把眼光放在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对立中时，应该从中抽身出来，站在更广的视野下去看胡塞尔。因为胡塞尔反对的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意识，而非用现象学的理性主义去解释科学。相反，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深陷其中的狂欢和无知，恰恰

十分需要作为方法的现象学的审视。

索内松避免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用更具操作性的视角去探索可行方案,从而使得符号学、认知科学和现象学得以融通,解决了关于认知符号学的认知问题的分歧和现象学的自然化转向中的自然主义矛盾,在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二、认知符号学对文化意义世界的探索

下篇的内容主要是认知符号学在文化意义世界的具体实践和应用,涉及的是“生活世界”“人与动物”“文化演化”“全球化情境”等问题,实际上是上篇所提及的方法从微观到宏观、从动物世界到人类文明的解释。其所述核心要义,一方面是对理论有效性的检视,另一方面也是将认知符号学独立应用于诸领域的探索。

下篇的论述始于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索内松认为,“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来解释自然科学模式构建的基础。这是一个由事物、人、太阳的升落组成的世界,而不是由细胞、原子和黑洞组成的世界”(2019, p. 162),亦即,胡塞尔将“意识”作为“生活世界”的观照点,正是索内松探讨认知符号学的关键所在。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是一切意义的起源,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起源于生活世界,也要落脚于生活世界,同时,人也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意义。根据索内松的理解,胡塞尔“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作为模型研究和转化的首要对象,以及作为科学家们完成他们的工作所处的常识世界”(2019, p. 158)。而且,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客观上完全一致的世界,而是“与主体相对”,这即是说一个事物的全貌不可能被我们的一个视角穷尽,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能是其部分,这一部分成为我们“注意力的中心”,我们可以通过部分推知整体。正如人们虽然只看到水杯的一面,但能够依靠想象对杯子的全貌进行把握,看到了正方体的一面就能够想象正方体的完整形状一样。

对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认同是索内松认知符号学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引入了文化符号学的代表——塔尔图学派。塔尔图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崛起于苏联的符号学派,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和鲍里斯·乌斯宾斯基(Boris Uspensky)是该学派的两个重要人物。索内松将塔尔图学派的研究路径称为“标准模式”,根据该模式,“每一种文化都把自身设想为秩序,而与外部的东西相对,这些外部的东西被视作混乱无序和野蛮,换句话

说,作为与文化相对的自然”(2019, p. 163)。这意味着,文化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与胡塞尔的提到的“主体相对”的生活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塔尔图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也在索内松的研究中被多次提到。尤克斯库尔是生物学家,1921年,他在《动物的周围世界与内心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周围世界”(Umwelt,也翻译为“环境界”)的概念。在尤克斯库尔看来,周围世界是生命体从自我出发建构出来的世界,由于每个物种对环境的感知不同,所以周围世界也各不相同。蜜蜂的周围世界和老虎的周围世界不是同一个世界,人的周围世界和动物也不可能相同。周围世界是一种动物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在其中,动物的感官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周围世界“包括生命体的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为世界(Wirkwelt),两者相互融合,形成功能圈(functional cycle)”(王新朋,王永祥,2017)。在阐述意义理论时,尤克斯库尔举了狗的周围世界和人的周围世界是多么不同的例子,比如人可以用来行走的楼梯,在狗看来只能用于爬行,大部分人生活所必备的家具,可能只是狗活动的障碍物。无论动物、人,还是其他生命体,对周围世界所赋予的意义,都是依据自己的认知展开的,每一个周围世界都是主体意识投射下的独特存在。

根据这个思路,具体到文化上,就有“自我文化”“他者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区分。自我文化是指将自我放在文化的主体位置,他者文化和其他文化都是基于自我视角下的文化关系。索内松对此文化主体性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关注‘我’的单一主体与所有被指定为他者文化或其他文化的所有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自我文化(Ego-cultural)中,成员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他者文化(Alter-cultural)的,然而,在反对另外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它必须被认为是自我文化的”(2019, p. 178)。

在关于他者文化的讨论中,移情理论经常被用到。从字面可知,移情的过程必然少不了主体和客体,这就涉及索内松前文所提及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2019, p. 179)。但这个关系具体为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经典的移情理论将他者看作自我的投射或推理,前者假设自我和他者都是已知的;后者则认为只有自我是已知的,他者需要通过推理创建。巴赫金用“作者”和“英雄”的概念来表达他对移情的看法,在他的话语体系中,自我是在无限的过程中变动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因此,自我永远不

能被完整把握，只有他者才是为人所知且完整的整体。这与经典的移情理论恰好相反。在对其他文化进行解释时，巴赫金也秉持此观点，提出“理解不可能通过与另一种文化的完全认同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进入另一种文化，然后回到另一种文化之外的位置来实现”（2019，p. 183）。亦即，试图从自我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另一种文化只能是徒劳，应该采取的是相反的态度。一些现象学家也对移情问题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关注，如胡塞尔、梅洛-庞蒂和古尔维奇等。索内松之所以引出一系列学者对移情的探讨，是想说明，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关系有多种类型，但无论哪种都离不开人文学科在其中进行解释的必要性，也离不开“将我们自身作为人的理解，以及将他人作为人的理解”（2019，p. 190）。

到此，我们便知索内松的认知符号学框架是如何探索文化意义世界的了。首先，现象学中关于生活世界的概念，成为解释生命体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普遍模式；自我处于意识主体，一切经验都是与自我有关的经验，因此，文化即是以“我”为中心的文化，文化不是散落世间的混乱，而是有特定的结构。其次，根据胡塞尔对生活世界层层内涵的划分，对文化也可循此进行不同角度的细分化，从而将文化问题作为类型问题来加以解决。最后，文化并不是机械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在进行着演化，借由不同的主体、情境等因素而不断被建构，因此，面对文化问题，用历时性的眼光看待或许更为有效。

三、结语

符号学的认知转向以及现象学的自然化转向问题都是多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而这两个争论实质也是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边界划分问题。一些学者将认知符号学的“认知”看作经典符号学里对符号意义的认知，也有些学者将认知等同于认知科学，是自然科学的范畴。前者将符号学视作人文学科，而后者则走向了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对此，胡易容提出：“心灵是个多元体，神经实验只提供了它某个生理维度上的切片。基于生物神经元个体的实验并不负责社会语境下的文化意义，实验室也无法穷尽社会文化中符号意义生成的所有变量。这实际上要求自然科学突破认知和意识的瓶颈，更深刻地理解‘人’，而这正是人文科学的工作领域。”（2015）索内松在研究中对现象学作为方法论的坚守，也正体现了他基于人之主体性的人文关怀。因此，用现象学在符号学和认知科学之间架起桥梁的方式不仅是一次勇敢的探索，

更是一次有意义的结合。

在当今国际符号学界，不同国别的符号学研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学术倾向。索内松所代表的北欧认知符号学研究，展现了符号学的哲学深度与经验现实相融通的尝试。这种尝试深具价值的一面，是对“学科范式预设”的反思。在索内松看来，符号学的认知转向并不仅仅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都受到了认知科学的影响，进而出现了某种认知转向。符号学的认知转向也是其中之一，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符号学本身即是以某种“意义认知论”为基础的学科，因此，符号学的跨学科之路恰恰是在“严格遵循自身逻辑体系的基础上与其他科学共同探索现有知识的边界的过程”（胡易容，2015）。

引用文献：

- 方圆（2020）.“自然化的现象学”是否可行——从当代认知科学的视角看.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14-18.
- 胡塞尔（1999）.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易容（2015）. 从人文到科学：认知符号学的立场. 符号与传媒，1，117-125.
- 索内松，约伦（2019）. 认知符号学：自然、文化与意义的现象学路径（胡易容，梅林，董明来，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新朋，王永祥（2017）. 环境界与符号域探析. 俄罗斯文艺，4，144-150.
- 西比欧克，T. A.，拉姆，S. M.（1991）. 符号学与认知科学. 哲学译丛，2，16-19.
- 赵毅衡（2015）. 关于认知符号学的思考：人文还是科学？符号与传媒，1，106-113.
- 赵毅衡（2011）.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Sonesson, G. (2006).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1, 135-213.

作者简介：

康亚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符号学。

Author:

Kang Yafei,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communication and semiotics.

Email: 294926750@qq.com